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1年6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28 期）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

6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和讯网、中国网、同花顺财经、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逾7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知名经济学家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逢锦聚、黄群慧、刘元春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三方面内容来展开：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的政治经济学创新；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 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

论坛第二单元，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这一主题，各位专家发表了精彩演讲。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具有十分独特的见解，这种历史自觉在理论上很快就落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纲领上。同时，历史的自觉也会转化为理论的自觉。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这就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把这种发展看作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继承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和原始性创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我们大概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时期值独创性的、创造性的理论包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创造性的贡献包括：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步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制度转型和生产力持续高速增长，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精确的概括。第三阶段是1978年到2012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经济制度理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论。第四阶段开始于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百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辉煌历史。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文科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洪银兴演讲的题目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公平和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尤其要强调共同富裕问题。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相对贫困仍然存在，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包括：自然原因、发展水平原因、体制和政策原因以及权利不公平原因。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包容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共享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配制度坚持要素报酬；第二，在区域发展上彰显优势；第三，在资源配置上突出市场调节。按照上述三个总体思路，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有五大思路。第一，在城乡、区域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主要需要解决区域二元结构、城乡

二元结构和乡村振兴等三大发展问题。**第二，要素报酬包容公平和效率。**关于要素报酬中的效率原则，最关键的是要完善评价机制，按贡献大小来决定要素报酬。关于要素报酬中的公平原则，最关键的是要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的差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第三，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解决好财产占有的公平权利问题是非常关键的。**第四，鼓励勤劳致富。**要解决勤劳致富的问题，一是要解决好充分就业问题，二是要准确评价直接劳动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要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真正同步增长。**第五，再分配阶段更讲公平。**在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建的社会保障账户中，要逐步增大国家支付的比重，建立起先富帮后富的实现机制，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上述分析，主要结论为：**第一，现代化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主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党的百年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晶，同时对于整个世界文明走出目前长期停滞的困境也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引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创新史和政治经济学百年的理论创新史，不仅具有中国样本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这种价值首先体现在中国实践证明了中国实践证明了现代化路径在当代世界并不只有一种模式，现代化的路径存在多元化模式，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本地化的基本思想蓝本、改革模式以及进一步进行思想创新的基本原则。并且，中国的案例实际上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各个国家，在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在解决超级问题的超级时代，都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养分和新的理论思路。要引领生产力的发展，要在防止经济过度波动中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生产力理论上有更深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走出目前长期停滞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第一，增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增长在市场层面、国家层面到底怎么进行布局，政治经济学对此提供了一个全视角的理论体系。第二，对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的哲学思考和战略布局已经成为整个新时代、整个社会进行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政治经济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存在进一步拓宽的可能，存在进一步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场景。第三，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和大疫情时代所展现出来的整体性崩溃，表明了

传统宏观调控理论已经全面失灵，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范畴、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战略、政策、实施体系。第四，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收入分配的思考、对于整个宏观层面动态资源配置价值实现的思考，在当代具有强烈的世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上述这四个方面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新概念、新体系、新规律、新战略举措，这些新的思想完全可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普适的政策工具。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主要讨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及其历史经验，通过这些宝贵经验可以归纳出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拓展。**第一，领导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始终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在矢志不渝地推进。**第二，中国共产党锲而不舍地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工业化的核心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特点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手段。在1978到2012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我国积极探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重心逐步转向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新时代，工业化道路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更加强调满足创新驱动、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与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的三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工业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的历程”、“我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现代工业体系”、“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三方面成就不仅具备伟大的历史意义，还具备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工业化本身给世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为世界上希望实现工业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如果要总结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三是积极探索和遵循大国工业化的规律，与时俱进、全面协调地推进工业化进程。**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逢锦聚**主要从宏观经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创新。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第二，探索了以计划和规划形式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理论。第三，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的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第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改革理论和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第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地提出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第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第七，社会主义政府经济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理论。第八，统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理论和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第九，统筹安全与发展理论。第十，将宏观经济调控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可以概括为三大经验：一是旗帜鲜明，人民中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二是尊重实践，紧跟时代，对的坚持，错的即改。三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次，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一个问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改革问题，还是要依靠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深化改革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本动力。第二个问题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要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着力和确保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第三个问题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靠生产力发展，必须靠全面深化改革，当然也必须靠宏观政策的调节。

刘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突破性发展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上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是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理论的探索，又是实践的探索，探索成果集中体现在三次历史性理论创新和发展上。

1、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的政治经济学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结合起来的创造，不仅实现了旧中国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而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使命“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实现这一深刻变革的基础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有许多不同，尤其是在土地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西欧封建社会的封君封臣关系基础上的土地封授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多层封授形成的一田多主，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及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清晰；而中国封建时代则不存在大量的土地层层封授，普遍存在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排他性更严格，可以继承和买卖。又比如中世纪西欧封建的重要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合一，公法与私权的合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即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封建地主在其土地上只

有经济上的权利而无行政司法权力，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相对而言是分离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同样具有封建性质。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可以交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因素历史更加悠久。进入近代以来，虽也开始萌发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一进程。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发，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发展至资本主义的可能。中国因此而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吗？显然不能。虽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排斥，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具有与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联合形成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可能，但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强大压迫下，他们异常软弱，具有严重的妥协性，不可能领导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则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对立，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为联盟，不可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否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直接走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按其基本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道路的革命。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具有怎样的经济基础？一是没收大资本，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领导力量；二是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存在；三是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反封建的小农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农业制度。后来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制定的“共同纲领”（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具有过渡性的，并且这种过渡方向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党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阐释）。在新中国成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即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过三年的所有制改造（1953-1956年，“一化三改”），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长期性的认识有所改变，在实践中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也比毛泽东同志原先设定的15年快得多，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但总的来看，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在所有制改造进程中，也并未因为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使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践中的重要理论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遵循苏联的经验。因此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苏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计划经济。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初期的1956年2月，就深刻指出：不能再硬搬苏联的一切，应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突出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率领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言，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基础性成就，没有这种基础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政治经济学突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正根本性的历史突破，是进入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之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并在改革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最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表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自觉和自信获得了历史性的提升，其中重要的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直到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上。经过几十年改革探索，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原则和实现方式，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及调节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三方面是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而言，在所有制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理论，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同时承认多种所有制，包括非公经济在内的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打破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僵化行政体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使国有企业在制度上适应市场竞

争，进一步提出并逐渐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改革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为基础，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同时保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权性质，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要求，明确提出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上，既区别于传统僵化体制，又根本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私有化。在经济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重要突破性发展。

就收入分配制度理论而言，改革开放伊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理论，从强调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到承认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前提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尤其是承认按要素贡献进行收入分配（由市场机制确定贡献，按贡献程度进行分配）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从打破平均主义传统，到允许一部分人（依靠劳动并遵纪守法）先富起来，到强调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从强调收入分配领域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强调效率与公平在发展中的均衡，强调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直到提出“共享”并将其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等等。这一探索进程，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认识和改革的进展有深刻联系，归根到底，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另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有深刻联系，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与其实现机制的变化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就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突破，在于创造性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并以此作为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在经济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兼容或统一的可能；在经济发展史上，无论是前苏联建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后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针对这一传统体制的改革，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直至最终以私有化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机制，即“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打破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逐渐培育市场，并根据市

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一般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起，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认识的创造性发展。与之相适应，在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上，打破计划与市场根本对立的传统，在改革和完善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渐引入并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打破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和调节方式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3、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对我们党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成果的继承，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新时代性开拓。

立足新阶段，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时代是出卷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能不面临新变化、新挑战，同时面临新机遇、新目标，同时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根本改变发展方式，否则便难以统筹“两个大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乘势而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基础上，进一步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进而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直到2050年前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但约束发展的条件和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不断演变的。如何把握历史机遇，适应各方面变化，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回应的主题，也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经济学说和科学指南。主题本身的时代性蕴含着思想的创新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作为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社会科学，需要首先明确基本立场和原则。就历史价值取向所体现的阶级立场而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深入结合。体现政治经济学阶级属性的最为深刻的理论基石在于其价值理论，任何政治经济学都是以其特有的价值理论作为其全部理论“最后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立场。以此为基础，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集中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于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具有纲领性、引领性、战略性意义。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理论结晶。四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国际化意义上的开放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

推进“术语革命”，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性理论成果。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术语革命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恩格斯），而术语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基础在于

思想上的变革，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等范畴的提出，是建立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总结和升华理论成果的同时，在范畴上对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实践，又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比如，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等等。这些以新的学术范畴概括的理论成果，鲜明地体现出思想的创新性，构成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崭新的因素”。

构建学说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系统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逻辑结构。一是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在于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标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二是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破解的突出难题是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科学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尊重各方面物质利益独立性的同时，逐渐推进共同富裕，以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积极性。四是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由此，形成了包括基本方法、突出问题、主

要任务、根本目标在内的学说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其科学性和生命力已经并且仍将不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所证实，同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顾海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具有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特征

顾海良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顾海良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上的发言

我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谈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历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对创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继承了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这一观点，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理解有更为独特的意蕴。1919年，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系列文章，青年毛泽东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青年毛泽东提到，中华民族原来就有自己辉煌的历史，他称之为“伟大的能力”。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阻滞和割断，但毛泽东预言，“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青年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做出深刻的展望，他提出“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应验了青年毛泽东的这一预言。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多个方面，都显示了这种“光明”的前景。青年毛泽东还预言“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的发展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生命活力。青年毛泽东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就能对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这种历史的判断，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自觉。

这种历史自觉在理论上很快就落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纲领上。1922年，中共二大就把这种历史自觉落实到了理论上，这个理论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一是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提出我们正处在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这是当时提出的七项任务的第一项。七项任务的第二项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党的“二大”已经看到了革命分两步走，也就是先后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第一大历史任务是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第二大历史任务就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那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所以，这种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自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和革命的最终目标的思想。

历史自觉也转化为理论自觉。1923年，李大钊提出，“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么宣传，我们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他提出，“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明确地说这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真义”，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找它的进步的道理。”李大钊在这里已经把历史自觉转化为理论自觉，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寻找出我们自己的革命建设的道路。这种见解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领导人的共同见解。例如，和李大钊见解相同，瞿秋白在1923年6月提出，“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这种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立场，也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在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学习。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提出要出版20种以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6月，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编自己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提出了系统的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计划。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深入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创新意义上的理论突破：一是**继承性的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形成我们自己的创新性的理论见解。二是**集成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资源，同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经济思想资源，集成为一个适合于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创新性思想。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当今世界各国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集成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理论见解。三是**原始的理论创新，即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有的国情、文化、历史、实践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我们称之为原始创造性理论。**继承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和原始性创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特别是理论创造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种新理论，这些创造性的理论更加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历程，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是刚才讲的党的“二大”提出的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完成。这一时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独创性的、创造性的理论，其中有两个理论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是**提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形态理论**。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是没有的，属于中国共产党独创的理论。当然，这一理论也吸收了列宁主义中关于殖民地的一些思想，但更多的还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这个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对一个完整经济形态在本质方面的界定，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形式既包含了资本主义性质，但又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包含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针对这一经济纲领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独创性、创造性的理论。

第二阶段是 1949 年到 1978 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同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创造性的贡献，在“一化三改造”这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自己的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的贡献在于同步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制度转型和生产力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中实现了三者的统一，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精确的概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我们所讲的过渡和转型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1956 年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同样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比如，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理论，以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同时还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这些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阶段从 1978 年到 2012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理论，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贡献。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得到了确认，我们才有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创造。

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创造还体现在五个主要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做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回答。二是经济改革论。我们认定社会主义是一个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要在改革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三是市场经济论。经过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确立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创新直到现在仍然在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伟大的理论创造。四是科学发展论。五是改革开放论。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对外开放论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理论，在主导性

理论下还延伸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

除了这五大理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概括为所有制的结构、分配方式的结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他提出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第四个阶段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包含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包括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括五大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点论、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20年-2050年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期间，还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与时俱进，因势而新。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是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高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特质的新时代的昭示。

百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为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辉煌历史。

第三，我们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这次美国大放水过程当中可以体会到，美国利用它国际货币的优势发行美债，给美国普通家庭和失业人口发放补贴来助推美国经济复苏，刺激美国老百姓消费。我想只有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了，在应对美国这种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举措上，才能够抵消部分不利影响。但人民币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长远的考量，需要积极推进。即应该从现在开始早做准备，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人民币的竞争力，用以抵御美国通过 MMT 的方式向全球征收“铸币税”。

洪银兴：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洪银兴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文科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

以下观点整理自洪银兴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上的发言

效率、公平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强调**共同富裕问题**。关于共同富裕，马克思早已有经典论述，他认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非常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强调的是所有人的富裕问题。

在站起来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机会，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什么叫富，什么是强，指的就是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强。**

进入富起来的时代，针对十年文革所产生的平均主义和共同贫困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富裕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进入强起来的时代，面对着富起来的同时所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表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这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阐述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

今天提到的共同富裕是在新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我们已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和上中等收入阶段。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的任务是要克服绝对贫困，而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要消灭绝对贫困，基本路径是效率性增长，也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尤其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的任务和路径就是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时就不能只谈效率，我们必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包容问题。

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已经通过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 0.47 警戒线上下，高于 0.40 的贫困警戒线，并且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表现在收入差距方面，还表现在财富差距方面。我总结了当前存在的相对贫困的几个主要原因：**第一，自然原因。**不同地区由于气候、地理、交通等原因造成了相对贫困问题。**第二，发展水平原因。**现在讨论的相对贫困不完全是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也与发展水平相关，而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城乡二元结构，其次是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二元结构，在后发展地区中农村发展水平更低，过去绝对贫困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现在相对贫困的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第三，体制和政策原因，**包括效率优先政策和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同时伴随着资本收益和投机暴富的问题。**第四，权利不公平原因，**主要包括权力寻租和行政性垄断收入。

在将相对贫困的原因概括为上述四个方面以后，我们来进一步研究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现在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现代化国家，但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都在批判这些国家在贫富分化方面的现代化病。因此，中国最初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共享现代化成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那就意味着要以人民群众的感受为标准，包括生活水平的相对标准、环境

质量的相对标准、公共服务的相对标准等，这些相对水平的比较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对于现代化的评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突出共同富裕，要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共同富裕包含“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也就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总要求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体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特别要关注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共计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大多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那样，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包容问题**。分配和效率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包容是指效率与公平共享的包容，一方面不能放弃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共享发展成果，这意味着既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体制和政策，又要突出共享发展，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这就意味着有两大问题要解决：一是要在发展中实现共享，二是要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解决好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

因此，**效率与公平的包容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配制度坚持要素报酬，这是突出效率，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体现公平；第二，区域发展上彰显优势，这体现效率，公平方面要强调协调联动；第三，在资源配置上突出市场调节，解决效率问题，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是要解决好公平问题。

按照上述三个总体思路，我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五个思路。

第一，在城乡、区域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区域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前不久，我在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了一个观点，“长三角一体化不能只关注先发展地区的一体化问题，更要关注后发展地区，要使它成为现代化的重点区域，能够使它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解决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问题，不仅要解决城镇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还要解决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最后，还要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能够真正使得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是解决三大发展问题：区域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乡村振兴。

第二，要素报酬包容公平和效率。目前，在要素报酬中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的差别，储蓄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的人，致富能力也更强，反之，致富能力则很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协调好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关于要素报酬中的效率原则，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完善评价机制，解决好市场评价中各种要素的贡献问题，按贡献大小来决定要素报酬，这就意味着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仅取决于投入，还取决于贡献和供求，这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的分配。

关于要素报酬中的公平原则，我认为关键是要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的差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劳动者的公平性发展问题，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劳动者也应该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就对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克服由于起点不公平而造成的结果不公平等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劳动者能够获取到知识和技术要素带来的收入。机会均等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包容，包括发展机会均等、投资机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而机会均等造成的收入差别也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

第三，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认为在私人投资和积累的背景下会产生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解决好财产占有的公平权利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包容效率，也就是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但是又要实现公平，那就要通过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包括通过员工持股方式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等。需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所有权、收益权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鼓励创新创业，使劳动者也能够获取知识产权收入和资本收入。

第四，鼓励勤劳致富。在初次分配领域就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不能仅指直接劳动者的劳动，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方面的劳动也属于劳动，这些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报酬连同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加起来就能够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要解决勤劳致富的问题，一是要解决好充分就业问题，二是要准确评价直接劳动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要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真正同步增长。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劳动报酬的增长不能只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报酬也就是必要劳动范围都有增长的趋势，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

第五，再分配阶段更讲公平。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外，我特别强调社会保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社会保障与北欧福利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在实现现代化以后的福利水平，我们是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提供福利，我们特别强调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不是养懒人的福利制度。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来看，首先，在我们建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建的社会保障账户中，要逐步增大国家支付的比重；其次，要建立起先富帮后富的实现机制；最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配置均等的问题，政府要以更平等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要强调享用公共品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要使中低收入者平等享用需要付费的准公共品。

综合上述分析，我提出的主要结论为：**第一，现代化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主线。**

逢锦聚：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逢锦聚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

以下观点整理自逢锦聚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上的发言

宏观经济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从宏观经济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以下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第二个是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总供给、总需求总量平衡理论，对宏观经济理论实现了重大创新，主要有十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新地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

第二，**探索了以计划和规划形式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不同看法，因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看起来不是很成功，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能否定探索利用计划和规划的形式来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用计划、规划的形式引领国民经济发展，这从“一五”时期就开始了。

第三，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引入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概念，创新提出了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的范畴并不是我们首先提出的，是在西方经

济学中大量应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引进了这个范畴，同时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改造创新，提出了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强调总量平衡，结构平衡一般交给市场实现，而我国把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放到一起考虑，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

第四，创新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改革理论和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这体现了我们的原创性，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我们的原创，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领域的改革和宏观调控当然也就具有原创性。

第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第六，创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第七，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府经济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

第八，创新提出了统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理论和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统筹国内国际市场两种资源理论提出得比较早，但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创新。

第九，创新提出了统筹安全与发展理论。

第十，将宏观经济调控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创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是旗帜鲜明，人民中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 旗帜鲜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人民中心就是谋划一切宏观经济问题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也是党的初心使命，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旗帜鲜明，人民中心，牢记使命，再加上不断改革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二是尊重实践，紧跟时代，对的坚持，错的即改。 这句话说得虽然有点直白，但却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走弯路的教训，例如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搞计划经济，实践证明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再例如在一些特殊时期谋划经济工作，违背了经济规律的要求，导致失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就在于，尊重实践，紧跟时代发展，对的坚持，错了就改，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自身的革命，把不正确的东西、把走的弯路逐步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这在宏观经济理论领域体现得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同时，又能够认真学习世界上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例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范畴和一些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包括利用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等，实际上也是学习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对这些适用的做法，不否定，不排斥，但在学习过程中又绝不照抄照搬，而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这三条经验是我们今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特别是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调控中，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的。

二、当前须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统筹发展与

安全，三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里首先有一个观念需要明确，就是宏观经济要不要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不要研究统筹发展与安全，要不要研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研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也需要拓展，不仅要关注国民经济总量、重大结构比例，也要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的根本目的，关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奋斗目标，也是一面旗帜，是引领宏观调控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当然需要研究。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本来就是一个宏观问题，当然也要研究。研究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不能不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不能不研究统筹发展与安全。宏观经济研究这些重大问题，看似是我们国家的特殊要求，但实际上也包含着人类社会宏观经济的一般性。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不研究这些问题，那是它的局限，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一定要研究，否则就不足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过去研究的不够或没有研究，今后要做出努力。

现在的经济学分工比较细，有些学者专门研究宏观问题，有些学者专门研究微观问题，有些学者专门研究基本理论问题，这些分工都是必要的，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但这种分工不等于分家。我主张研究基本理论的学者也要研究经济运行，包括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也要研究经济发展；而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也要研究基本理论，否则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缺乏根本的理论指导，甚至没有明确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建议今后的宏观经济研究中，要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要注重对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长远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如果对此可以形成共识的话，那么对后面三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就有了基本认识上的基础。

第一个问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长期战略，也是当前要着力解决的宏观重大问题。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变化的战略举措，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总的原则是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关键是如何实现主题、主线、战略基点相统一，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需求响应供给，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形成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也是宏观问题，但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改革，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本动力。特别要注重改革流通体制，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增强产业链工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夯实农业基础，推动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是基础，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两者统一、相互促进。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

毋庸讳言，当前国外市场出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搞单边主义，处处遏制中国。我们要立足国内，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结合，以国内市场为主，要自立自强，打破超级大国的封锁，使我国经济更加健康顺畅地发展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提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没有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要把国家安全作为重大战略实施好，在确保国家安全和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着力和确保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内容很多，例如粮食、能源等战略性资源的安全；重要产业、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关键领域的安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增强产业体系和流通体系的抗冲击能力，确保金融安全、财政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等。另外还要确保生态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前特别要密切注意防范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尽管近几年我国的PPI和CPI基本

都保持在一个正常甚至是较低的水平，但是从国际环境来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放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对我国构成了一种威胁，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预防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的准备。

第三个问题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如何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国民经济更加充分、更加平衡发展的宏观经济问题。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着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体现着改革发展的根本宗旨，也反映着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靠生产力发展，必须靠全面深化改革，当然也必须靠宏观政策的调节。**

就宏观政策而言，**首先，要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快乡村振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的学者不太赞成提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而建议只强调提高劳动收入，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当然要着力提高劳动收入，但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所以在强调提高劳动收入的同时也要强调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以农村居民为例，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可以靠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获取一定的报酬，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财产性收入。**再次，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最后，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再过十多天，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让我们在已有宏观理论创新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元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世界价值和时代意义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上的发言

党的百年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着全局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具有引领世界体系走出当前长期停滞困境的思想与理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最为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价值，都具有超越区域价值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升华理论，同时还要用中外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及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目前，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也全面达成，我们的实践和创新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决定了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将随之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个新高度，只要我们能够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新的典型事实、新的规律、新的范畴和新的框架，用中外社会都能够理解的概念、范畴和表达，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案，我们就能证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创新史和政治经济学百年的理论创新史，不仅仅具有中国样本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世界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国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中国实践证明现代化路径在当代世界并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现代化的路径存在多元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但同时也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虽然其核心是阐释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过程中的一系列新规律、新方案和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针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面临的很多共性问题提出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方案和新思路，特别是它充分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范本和思想解放的路径；特别是它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本地化、实践本地化的基本蓝本和进一步进行思想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不需要进行简单的制度输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胜利的支撑下自然在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另一条现代化路径的思想。

这种现代化思想是以前西方主流思想提供的方案难以比拟的。

一是经济的赶超必须有适合技术赶超的制度设计；

二是制度设计的逻辑不仅要适合现代化的产业和技术路径，更需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文化资源禀赋相适应，必须在全球化的动态发展中来考虑激励体系的设计；

三是强政府不仅是克服市场失灵必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市场体系自身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西方社会并没有为落后国家构建强政府提供现成的方案；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伪了传统理论的很多偏见和谬误，社会主义体系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证明了不同国家根据不同使命和条件在政府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进行多层次的组合和创新；

五是政府不仅要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者，同时也必须是自我改革的推动者，这需要政府在改革创新与发展创新中构建足够的激励体系，以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自我完善；

六是宏观调控必须从宏观治理和经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进行设计，不仅要追求短期经济周期的熨平，更重要的是在防治体系性崩溃的前提下，保证静态资源与动态跨期配置的和谐，发展规划统筹下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体系以及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

发展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七是不均衡、异质性是落后国家经济的核心特征，在全球化中寻求发展的平衡，在结构性突破中寻找总量的动力是解决落后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效方法。这些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史所孕育的一些基本规律，都是对于落后国家赶超可以借鉴的一般性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百年发展史，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广大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世界性的智慧。

那么，中国的案例是不是只有对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对于世界各国在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解决这个时代提出的超级问题都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养分和新的理论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这个超级时代的一部分，中国实践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核心、最活跃的力量，它的发展就是这个时代迈向辉煌的核心动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回答这个时代命题的前提下回答中国问题，因此也必将在构建中国方案的过程中蕴含了解决世界问题的养分，甚至直接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史中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如何成功地运行，如何在克服资本主义单一私有制下的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弊病的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在静态和动态层面的最优。所以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全面拓展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拓展了对政府体系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政府与市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全面超越了古典主义所塑造的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划分法，突破了政府守夜人的概念。在这种深化中，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要引领生产力的发展，要在防止经济过度波动中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要在克服各种陈腐思想和传统利益结构中解放生产力的发展，要使人类技术进步走上一个新周期、新轨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生产力理论上有更深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走出目前的“长期停滞”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增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增长在市场层面、国家层面到底需要如何布局？在

总体规划、产业结构、投资政策、宏观调控上如何配合中期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全视角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新的大国竞争格局中，各个国家都开始重新反思构建在新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哲学。大家会看到，印度已经旗帜鲜明地要求重整其计划体系的功能，美国国会也已将新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提上工作日程，甚至整个 G7 联盟在下一阶段对于民族产业链的规划也已经全面突破传统的思想。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对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的哲学思考和战略布局已经成为整个新时代、整个社会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拓宽和优化，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时代进一步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场景。

第三，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中，在大疫情时代中所展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崩溃，表明了传统宏观调控理论已经全面失灵，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范畴、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战略、政策、实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总结了很多的范畴，比如以发展规划为引领，以货币财政政策为主体，以区域、投资、产业、就业等政策为配套的整个宏观治理体系，并将这个治理体系归到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理论的范畴之中。对于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就短期谈短期，而是中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它的主线也没有简单地按照西方的一些基本的教条来进行，比如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规则性、短期预期的定位等，而是在充分地吸收现代经济学养分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整套体系化的思考，这对于解决目前宏观调控中的各种世界难题，可以提供大量新思路。

第四，**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收入分配的思考、对于整个宏观层面动态资源配置价值实现的思考，在当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世界性**。一些西方学者已敏感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两极化已成为世界难题，而西方提供的传统解决方案难以在新时期发挥作用。解决的思路是什么？我们认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会看到一系列有用的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这是很重要的思想。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就收入谈收入，而是要围绕整

个循环体系来做文章，特别是在所有制层面来做文章。如果没有在这上面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安排，单纯就现象谈现象，就很难触及到这个时代问题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上述这四个方面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新概念、新体系、新规律、新战略举措，这些新的思想完全可以在实证层面和规范层面，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普适的政策工具。

下一步我们要在新征程中进一步加大力度，彰显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共产党百年历史，不仅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层面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蓝本，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类社会走出困局提供了有用的思想养分，因此，**我们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将具有世界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